

同心 e 评

在讲好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中 发挥福建的作用

■ 罗佳

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法案一大亮点在于,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理论思想层面正式落实到了法律制度体系中,为大家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和谐生活、维护团结提供了明明白白的法律遵循。这不仅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大进展,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制度保障。

当前国际舆论场中,所谓的“民族问题”正成为一些国家攻击中国的重要议题。一些机构和媒体借所谓“民族问题”,刻意拼贴材料、歪曲历史,对中国民族政策进行恶意抹黑。这类叙事往往忽视中国历史的真实脉络,也无视中国民族关系的现实状况,其目的并非学术讨论,而是通过制造族群对立来削弱中国社会的凝聚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讲好中华民族的历史与现实,显得尤为重要。中华民族的历史并不是彼此隔绝的族群史,而是一部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从先秦时期多族群互动的格局,到秦汉以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逐渐形成,再到历代王朝不断巩固统一、促进各民族融合,中国历史的主线始终清晰:各民族共同创造文明,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也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这一命运共同体。

正因如此,在讲述中华民族历史时,更需要旗帜鲜明地确立正确立场。近年来,一些网络言论刻意歪曲历史,将复杂多元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简单套入西方民族理论框架,或者不自觉地落入西方话语体系的陷阱,制造所谓“族群对立”“民族压迫”的叙事。这类观点看似“标新立异”,博人眼球,实则往往滑向历史虚无主义,并与极端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相互勾连,成为制造民族隔阂、煽动社会情绪的重要思想源头。

对此必须保持清醒警惕,在历史叙事和现实传播中持续肃清民族分裂主义的流毒。

新时代讲述中华民族历史,需要立足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与文明传统,讲清楚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真实过程,也要讲清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所蕴含的文明内涵与制度优势。只有在这样的叙事框架之中,中华民族的历史才能呈现出真实面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也才能被世界更清晰地理解。

在这一宏阔的历史图景中,福建拥有鲜明而独特的实践经验。从历史上看,福建既是多民族交往交流的重要区域,也是中华文明对外交流的重要门户。

泉州便是一个典型例证。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宋元时期泉州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商贸易,不同民族在此相遇相知,不同信仰在此交织互动,不同文化在此交流互鉴,形成“市井十州人”“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盛景象,共同塑造了泉州多元、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外来族群与当地居民广泛通婚、共同生活,逐渐形成“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社会结构。许多族群的生活方式与闽南地区宗祠祭祖等传统习俗相互融合,成为地方社会的一部分。这种历史进程,正是中华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实写照。

此外,福州长乐琴江满族村记录着满汉军民并肩守土的历史记忆,宁德畬乡长期形成畬汉群众共同生产生活和社会格局……福建各地同样留下了各民族团结的历史见证,展现出各民族交融的生动图景。

近年来,福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加强与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把民族工作摆上党委重要议事日程,努力建设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窗口。

在推动民族地区发展方面,福建持续实施对口帮扶民族乡村工作。自1998年以来,省直单位和经济发达地区对口帮扶民族乡村实现全覆盖,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进步。全省少数民族贫困群众提前实现脱贫,民族乡村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福建不断完善“大统战”“大协同”工作机制,推动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落地落实。城市民族工作纳入城市治理整体格局,各族群众在学习、就业、创业、生活等方面互融互润、相互尊重。

在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方面,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全过程。通过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福籽同心爱中华”等活动平台,一批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文化作品和先进典型不断涌现。同时,福建依托两岸交流优势,持续举办海峡两岸各民族文化交流活动,促进两岸同胞在文化交流中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维护民族团结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法治保障,也为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提供了制度支撑。

历史已经证明,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面向未来,福建要依托自身深厚的历史积淀与丰富的现实实践,在讲好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中发挥更大作用,让八闽大地的生动实践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注脚。

(作者系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讲师)

闽东深山处 一馆藏侨史



闽东深山处 一馆藏侨史

闽东山区屏南县村头村里,藏着一座独具特色的侨史馆。

据记载,这座建筑始建于17世纪中叶,占地约300平方米,整体为三进五开的二层砖木结构,保留着闽东传统民居的韵味,在细节处,也兼具南洋建筑的特色。

村头村是屏南县重点侨村。自清末民初起,便有大批村民赴南洋谋生,逐渐形成“一村半侨”的独特格局。

为留住珍贵的侨乡记忆,村里将这栋历史悠久的侨居改造成为侨史馆。展馆以“根在故土、情系南洋、反哺桑梓”为主线,设三大板块。“远渡重洋 创业维艰”板块,通过老照片、侨批、旧家书等珍贵文物,再现侨胞闯荡南洋的艰辛历程。“心系家国 桑梓情深”板块,以侨胞侨眷捐赠的实物与史料,彰显海内外乡亲恋祖爱乡、反哺故土的赤子情怀。

“侨韵传承 振兴乡村”板块,则生动展现侨胞联络联谊、侨文化与福文化融合、侨村文旅融合发展的鲜活实践。

如今,村头村以侨史馆为载体,举办“侨家乐 福见福建”、侨村垂钩赛等系列主题活动,吸引众多乡亲回乡寻根,让侨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焕发新的活力。

(闽同心)



扫一扫 看视频

张燮：徐霞客“三顾”的地理学家

■ 赵凯

1628年,崇祯改元之初,徐霞客来到福建漳州。他已经行走天下二十载,却在这座海滨城市停留良久,并在六年内三次重访。这个举动,在他终生跋涉的旅程中,显得异常鲜明。他不是为了一处山水而来,而是为了一位文士——张燮。

一个面朝大海的士人

张燮(1573年—1640年),福建漳州人,出身书香门第,自幼聪慧,十六岁即补诸生,万历二十二年中举。之后四上春闱皆未中,便不再求仕,以举人终身。他虽未入官场,却以其著述与操守赢得广泛敬重。

他的一生充满风雨。1608年起,张燮先后经历父母逝世、妻儿早亡等重大变故。亲人相继离世,加上身体羸弱,让他的心境日渐沉寂。

张燮中年后便不再有庙堂之志。他谢绝了何乔远、阮大铖等人三番五次举荐他人入京修《神宗实录》的建议,表明“志在竹帛千秋,略无再入长安之意”。

他将精力投入著述与刻书之中。他居于漳州南岩,先后建有霏云居、群玉楼、万石山房等书斋。在《霏云居记》中,他写道:“余欲示世以无复出理,乃趣治工,不暇计其贫俭也。”他曾因家贫典当别业,只为维持刻书开销和接待文友。诗社、词盟、文会,是他精神生活的支柱;他与林茂桂、郑怀魁等人并称“漳州七才子”,亦与黄道周、焦竑、何乔远等海内文士过从甚密。

张燮好游历,在峰山、铅山、武夷山、天柱山、九日山等地都留下诗文。他的文字不仅记山川之形,更寓人生之感。他所作《群玉楼集》收文数百篇,另有《东西洋考》《漳州府志》《海澄县志》等重要著述流传。

一生清贫寡欲,著述满家。他是晚明文士中少有的集儒、释、道之气骨于一身的写作者。他笔下的世界,既有世故人情,也有天地风涛。

在书斋里丈量海洋

张燮将生命中最沉静也最有力的时刻,留给了《东西洋考》这部以一人之力完成的巨著,留下了他对更大世界的冷静观察与细致描摹。

福建历史深处的名人



东西洋考
主脩姓氏
督餉副使金陵王逵宗棧梓
署都司李泰和蕭 基訂正
龍邑令君荆溪吳 奕泰定
前澄令君樵李陶 燦亦訪
澄邑令君臨川傅 樵泰閔
纂脩姓氏
海濱逸史龍溪張 燮撰次

張燮紹和識
港者則書從此分途輒入某國其後又從正路
提頭值叙向前其再值迂路亦如之庶幾尺幅
具有全海稍便披閱若謂新豐之難大識路移
消之臺榭積蘇則吾豈敢
一藝文逸事不載者尚多無論擿別所未及即
余自能親記者亦僅行其一轡聊待後人之補



《东西洋考》东南南海夷诸国总图

书中共记述东洋、西洋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涵盖国史、风俗、地形、物产等内容,并汇集大量航海细节。《舟师考》一卷,是整部书中最具“技术含量”的篇章。张燮在其中详载从漳州出发前往诸国的针路,指出行船时的罗盘方向、需转舵的地标、潮汐起落的时段、水深浅的界限,甚至包括船舶到达某处后要“打水”多少、何处可以停泊避风等实际操作。这些资料多数来源于船人经验,张燮反复求证、整理、归纳,加以系统书写,成为后世研究明代航海技术的重要资料来源。

在旧有《针经》中,许多内容仅为船人间口耳相传的行话、俚语,张燮特别注重对这些术语的解释与补正。他在《自序》中写道:“其有故实可书者,为补述之;其破碎者,为补成一片。”他不是仅为记述而记述,而是力图将零碎经验转化为“凡人可读”的实用知识。

他的眼光,不仅局限于中国与异邦的通达路径,也关心通商行为的安全性及公平性。《东西洋考》对各国对待中国商人的态度进行了细致对比,例如,占城“屈辱我商”;猫里务虽利通贸易,却“多有海盜劫掠之事”;而暹罗国则“市井安平,互市公平”。张燮据此为出洋商人提供现实选择,指导他们趋利避害,避开危险区域,优先前往态度友好的邦交之地。

除了针路与安全,他还记下了各国的特色物产及市场价值。例如他指出交趾盛产丹砂、占城出贝齿,爪哇出犀角、龙涎香等。通过这些记载,不仅让商人清楚远洋之“可图”,也为朝廷了解海外资源提供依据,弥补了史书中海外诸国“嘉隆以后为尤略”的空白。

可以说,《东西洋考》不仅是地理志,也是全球贸易手册,是将“海洋知识”转化为“国家情报”的著作。而完成这

项工作的,是一个没有出海、没有功名的隐士,在山居书屋中、在贫病交迫中,以纸笔织造出中国人认识世界的知识坐标。

他未曾远航,却比许多登船者看得更远。他不依赖地图,却让《世界图谱》在书页中展开。他以一个明代士人的身份,走到认知空间的边界,并为后来的中国留下了可通、可行、可用的世界认知方式。

字里行间的警醒之言

在晚明这个海上贸易兴盛与列强侵扰交织的时代,张燮不仅仅是一个记录者,他更是一位具备前瞻性的知识人。《东西洋考》中相当一部分内容,反映出他对国家海防、外交危机以及边疆治理的深刻思考。这使得这部地理志不仅仅是世界通识手册,更是一部有关“国家处境”的清醒之书。

他最直接的关切之一,是对外来势力侵扰中国海疆的警觉。在《外纪考》中,他记录了倭寇对浙江、福建、广东等地长期的劫掠,并具体描写其手段之残忍:“焚官廩、墟民舍,缚婴儿竿上,沃以沸汤,卜孕妇女,剖视胎孕为乐,残毒不忍言。”这种细致的描写,并非渲染残酷,而是张燮在努力传达一个危险信号:国家必须正视海防的松懈与敌人之凶狠,不能再以内地为中心,轻忽边疆防务。

更严重的,是殖民势力的渗透与掠夺。在记述佛郎机(葡萄牙)与红毛番(荷兰)的章节中,张燮详细描述了西洋列强如何在吕宋、澎湖、马六甲等地设点扩张,甚至一度与中国沿海贪官勾结,企图染指漳州。他记录荷兰人舰船之制、火器之利,形容其“舟设三层,旁设小窗,各置铜铳”,“大铳发动,洞裂石城,震数十里”,显露出一种超越文化优越感的军事现实

判断。张燮清楚,这些国家不只是贸易伙伴,更可能是未来的敌人。

他对外交局势的把握极具系统性。例如,他在《西洋列国考》中分析马六甲的归属与暹罗的交恶、亚齐的通贡记录,彭亨与柔佛的战争、婆罗的内部纷争,构建出一幅充满张力的东南亚政治图景。他特别指出,马六甲“奕世朝贡,用深帝眷”,但也曾因暹罗进犯而遣使告急,足见地方王国之间常有战争与附属关系的变动,中国的朝贡体系其实并不稳固。

此外,在《餉稅考》中,张燮也体现出强烈的国家责任感。他在《吕宋纪事》中记录了“压冬”华侨在吕宋被屠杀的全过程——张燮报吕宋“机易山有金豆”,导致朝廷派员考察,引发西班牙殖民者心生疑忌,制造惨案。张燮不仅记录过程,还追溯起因、批判中外政失,指出此事不仅是商人之灾,更是朝廷情报系统失效的后果。他写:“众人逃散后饿死山谷间,横尸遍野,合计两万五千人,幸存者仅三百人。”这一描述令人震撼,流露出他对国家缺乏海洋治理意识的深深忧虑。

此外,在《餉稅考》中,张燮分析了“海禁”与“开海”的制度循环,指出其根源在于官府既要遏制走私又要倚赖商税,政策往往摇摆不定。他提出明确主张:应结合实际、善用地方经验,在开禁与监管之间寻求平衡。特别是漳州月港作为唯一合法对外贸易口岸,其税馆设立、餉份分配、巡检制度,都被他系统梳理,为海改改革留下宝贵参考。

徐霞客第一次到访漳州时,张燮刚刚完成他的《东西洋考》,这或许只是一种巧合。但在冥冥之中,又何尝不能看作两位士人的“量子纠缠”?与徐霞客走遍千山万水不同,张燮没有远航,却抵达了那个时代中国人认知世界的前沿。最终,我们记得他,不是因为他被谁拜访,而是因为他他在凝神静气间,写下了传世作品。